

从工资条看李大钊的革命底色

从图书馆主任到教授

李大钊的月薪,依据的是 1917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蔡元培是一级校长,月薪 600 元;陈独秀是四级文学科学长,月薪 300 元。李大钊当时不在教员序列,他领取的是五级主任的月薪 120 元。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使得北大图书馆由一个封建藏书楼变成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图书馆。1918 年 10 月,北大红楼落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入,几乎占去整个一层楼。一楼东南角有两间房连通,外间是图书馆会议室,里间则是李大钊的主任室。也就在这个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和李大钊一起工作了 4 个多月。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正是在李大钊指导下,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黄日葵、王复生等 19 人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的声誉日隆。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1920 年 7 月 8 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议,全体通过“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此后,李大钊便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图书馆主任,

1920 年为政治学系教授,1921 年改聘为史学系教授。聘为教授以后,他的月薪也变成了 200 元。

当时的国立大学教员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和助教,一共 4 等,每等 6 级。原则上,教员连续工作满一年就可以晋一级。

从 1920 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开启了在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除北京大学之外,李大钊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课程,当时是以讲师身份计酬。讲师,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设的兼职工作岗位,只按授课钟点给予酬劳,视难易程度从两元至五元不等。

受聘为教授之后仅几个月,李大钊就入选了“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北京大学评议会,成为评议员。从 1920 年至 1923 年,李大钊连续 4 年当选,且得票数逐年增加。

1922 年 12 月,李大钊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转任校长办公室秘书。1924 年以后,李大钊专注党的工作,只保留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此时,他的月薪已涨至 280 元。

三张薪俸收据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有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的三张薪俸收据,每月 280 元的月薪都由夫人赵纫兰代领,最晚的一张是 1927 年 2 月 1 日,此时距离李大钊英勇就义仅有两个多月。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张工资条的拖欠时间基本上都超过了半年。1926 年 9 月领取的薪俸是上一年 3 月的,1927 年 1、2 月领取的薪俸是上一年 5、6 月的。其中,1927 年 2 月 1 日领取的只是半薪,也就是 280 元的一半。

堂堂大学也会出现拖欠教职员薪俸的情况吗?这是因为当时的军阀政府为了争权夺利,经常推迟拨付教育经费。冯友兰回忆说:“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早在 1921 年 3 月 15 日,北京国立八校就成立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开展索薪斗争。会议推选北大教授马叙伦为主席,李大钊为新闻股干事。马叙伦被军警打伤后,李大钊代理主席,继续领导斗争一年多。这也是造成他没有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月薪都是在一个月以后分两次发放,每次支付半额,且多以“现洋五成中票五成”发放。所谓“现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薪俸中一半以银圆(即现大洋)支付,一半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兑换券)支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它们发行的钞票或兑换券(简称“中票”)在市场上贬值,很难兑现。

因此,李大钊前两张薪俸收据上的 280 元应是足月工资,能一次领到较为难得,而第二张薪俸收据的 140 元,明显只是半月之数。

接济贫寒青年,支持革命活动

李大钊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很少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花钱。在北京大学任职之时,李大钊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对此,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将有限的生活费精打细算,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李大钊接济过包括刘仁静、曹靖华等人在内的许多贫困学生,从保留下来的借薪收据中可见一斑。

有一张印有“北京大学用笺”抬头的信纸,“今借用大洋叁佰元”,两张专用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金额分别是 63 元和 175 元。最后一张的数额较大,是 1924 年 6 月 5 日,由同事于树德代收的 400 元的借款单据,几乎等于李大钊一个半月工资。当时,正受到京师警察厅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派他率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临行前,他委托于树德到北大借款 400 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的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秘密召集会议,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 80 元为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很多时候,明明工资已经捉襟见肘,李大钊还继续写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扣除。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而且北京的生活成本较低。一个小家庭如每月有 100 元,便是很好的生活了。本来,李大钊可以安安稳稳地拿着高工资在北大教书,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为了寻求真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用自己的苦难和动荡为大众争取幸福和安稳。

李大钊英勇就义后,中外记者到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 3 号家中采访时,震惊不已。《晨报》《京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就连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也撰文称:“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纷纷为赵纫兰及孩子们捐款。这其中还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领的两张“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时间是 1927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8 日,金额分别是 224、264 元。李大钊一生中的借款,从来都是慷慨地用于党的事业和其他同志,这一次终于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 据《人民政协报》黄黎/文

祖父杨度营救李大钊

祖父杨度晚年的经历中有两个人对他有重要影响,一个是胡鄂公,一个是李大钊。胡鄂公是我祖父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他觉得我祖父当时的某些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相通之处,就给了他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劝他看一看。

1927 年 3 月,胡鄂公得到北洋政府可能要实施镇压的情报,他先将李大钊保护在宣武门内自己家中,后又转移到苏联大使馆。祖父在熊希龄长女的婚宴上,从曾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口中得知政府要派员进入苏联使馆搜查的消息后,立即托词离席,一边亲自去找胡鄂公向其报信,一边叫我的父亲杨公庶去章士钊家报信,因为他知道章李两家关系最密切。

照理,4 日离张作霖采取行动还有 48 小时的时间,李大钊要躲避是来得及的。但是,大部分躲在苏联使馆的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

的,因为八国联军入北京以来,还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而李大钊也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最后,只有四个同志逃脱。

李大钊被捕后,祖父与胡鄂公等商量组织营救事宜。胡一方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筹集经费进行营救。为了与胡鄂公筹集营救经费,祖父甚至将寓所“悦庐”变卖,毁家纾难。胡鄂公还打算组织铁路工人劫狱。后因李大钊不同意,未实施。

4 月 28 日,李大钊等 20 人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祖父和胡鄂公为了周济他们的家属,或帮助他们脱险离京,所蓄为之一空。

1931 年夏,祖父自觉病体一天不如一天,给自己写了个挽联总结自己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据《名人传记》杨友麒/文

